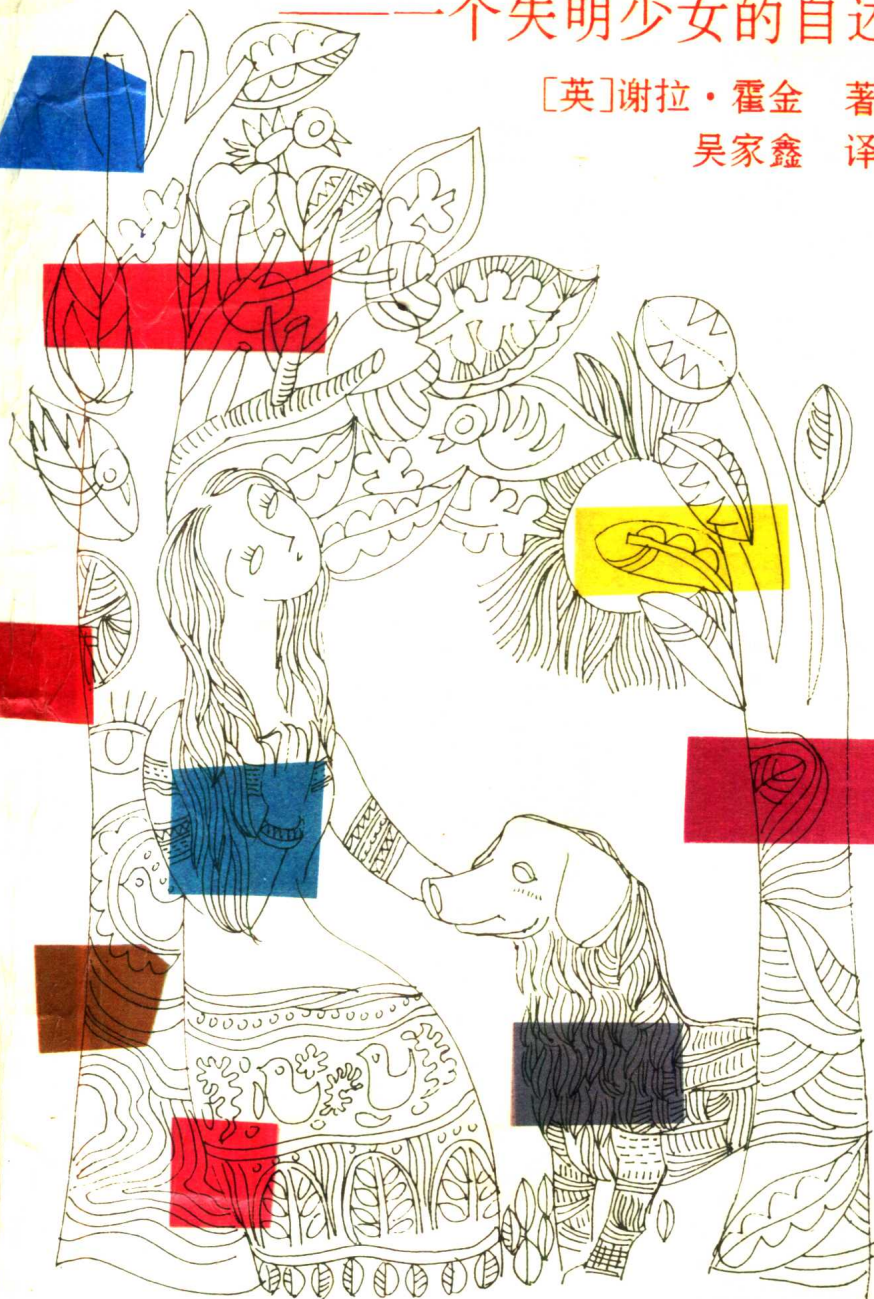


# 爱玛与我

——一个失明少女的自述

[英]谢拉·霍金 著

吴家鑫 译



# 爱 玛 与 我

—— 一个失明少女的自述

【英】 谢拉·霍金 著

吴家鑫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爱玛与我**

—— 一个失明少女的自述

【英】 谢拉·霍金 著

吴家鑫 译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轻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5.375 印张 130(千)字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3.95 元

ISBN 7-5043-1395-5/I·126

# 目 录

---

第 一 章	少女时代.....	( 1 )
第 二 章	新伙伴爱玛 .....	( 18)
第 三 章	导盲犬训练 .....	( 32)
第 四 章	又回家了 .....	( 42)
第 五 章	女友阿妮塔 .....	( 49)
第 六 章	爱人 .....	( 67)
第 七 章	完全的独立 .....	( 78)
第 八 章	在夜校里 .....	( 88)
第 九 章	世界延展了 .....	( 97)
第 十 章	爱玛救了我 .....	(109)
第 十 一 章	新的希望 .....	(118)
第 十 二 章	眼手术 .....	(126)
第 十 三 章	绷带打开了 .....	(133)
第 十 四 章	光明! 光明! .....	(142)
第 十 五 章	新的生活 .....	(155)

# 第一章

## 少女时代

---

我四岁时，慢慢地摸索着走在通往大门口的花园小径上。我伸出一只手，用手指探寻到门上的弹簧锁，然后打开大门，穿着丝绒衣服站在人行道上注意倾听着那里有没有别的孩子。我侧耳倾听，因为我只能依靠听觉判断他们是否在那里玩耍。

从马路的另一边，我听到了男孩子们的声音和球弹在墙上或木门上发出的声响。我兴奋地大声喊道：“喂，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我能去找你们做游戏吗？”

球停了，等待我的只是无言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听到一个男孩子回答说：“不，不能。你玩不了，小对眼！”

我转过身，无奈地摸索着回家的路。我刚一离开又听到球开始弹了起来。我感到莫明其妙，但这并没有让我伤心，我根本不明白男孩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妈妈，妈妈！‘小对眼’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男孩子总这样叫我，还不让我跟他们一起玩游戏呀？”

妈妈又是和以往一样地回答我：“谢拉，他们是坏孩子。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和他們一起玩耍吗？他们都非常调皮。”

“可是，为什么他们叫我‘小对眼’？”

“他们太不懂事了，这是一个非常坏、非常无礼的名字。”说完她把话题迅速转开，给我拿来玩具熊。于是，妈妈、小熊和我立即玩起了游戏，男孩子叫我无礼的名字这回事很快就被我忘到

九霄云外去了。

这就是妈妈处理这件事的一贯方法与态度。她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别的孩子视力比我的要好得多；她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我们家除了我，爸爸、她自己 and 哥哥格瑞海姆也都看不见。因此，我虽从小就不能像别人那样凭视觉看人、看东西，却丝毫也不知道自己与别的明眼人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奇怪而不寻常的不是我，倒是马路对面的那些男孩子们。

1946年，我出生在英国诺丁汉的比斯顿。在我小的时候，曾稍微有一点点视力，但无论看人或者看物，都只是模模糊糊的影子，迷离朦胧的一堆色彩在眼前晃来晃去，视像很不清楚，就像它们都罩在一片薄纱之中似的。当我从很近的地方看时，就如同人们从几英寸之外观看一张巨幅的油画那样。妈妈和爸爸的身影使我感到愉快、温暖，可我从不知道他们的脸是什么样子。我睡梦中的人也全没有面孔。不管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所有的一切都是与雾混同为一体的，这就是我对这世界最初的回忆。

我的哥哥格瑞海姆比我大三岁。我们兄妹俩都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结果引起了视网膜损坏，这是从我父亲这一系遗传下来的家族病。我妈妈患有另一种眼疾，是她小时候得风疹病留下的后遗症。因此我们全家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失明。只有我爸爸还保存着足够的视力，能够从事兜售绒布的生意养家糊口。

我的家庭意识来自烤饼的味道、炉火发出的噼啪声和它的温暖，而不是它的火焰的光亮。当我们全家围坐在桌旁吃晚饭时，爸爸让哪个人把盐递过来，她或他就用手指沿着桌布搜寻，摸的时候，常常会碰倒桌上的玻璃杯或瓶子。但大家对此都不以为然，它是天经地义的。哥哥和我根本不知道这只是在我们家才常常发生的麻烦事。

我们在杂货店购买东西的情景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虽然看得见玩具的形状，但是不经触摸就分辨不清它们是什么，妈妈的眼

力也好不了许多。本来，“不准触摸”是商店对孩子们的规定，而妈妈总是得到售货人员的同意，让我触摸那些洋娃娃、毛绒绒的动物和积木盒。

在我幼年的记忆中，有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一天，妈妈领我上诺丁汉一带有名的斯堪根尼斯海滨去玩。我坐在转马椅上，在自己关闭的领地中快乐地旋转。真开心啊！玩完一轮后，我没有立即从彩色马的座位上下来，而是按照习惯等着妈妈来找我，因为我眼睛不好找不到别人，只能让别人来找我。于是，我仍然坐在那里。但是我被一位尖嗓门的妇女从上面抱了下来。几分钟之后，我吓得嚎啕大哭起来，被送到了失物招领处。好一会儿之后，我透过泪眼看到一个人影朝我走来。开始，我还以为是哪个要帮助我的人，直到我闻到她身上熟悉的气味时，我才辨别出那人影就是我的妈妈。“噢，是您来了？”我说，“我还以为妈妈是别的阿姨呢。”那句话，从此成为我们家的私用语言。

为什么没有为我的眼睛做手术呢？因为那时眼科手术的技术还远不如今天这样先进。我家其他人的眼疾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我哥哥去医院手术之后，回家时一只眼的视力完全丧失了。（虽然他一只眼比我两眼加起来的视力还要好。）我也曾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特别是在有了我哥哥的遭遇之后，我父母坚决反对再给我施行任何手术。

做为注册的盲人，我和哥哥都可能按照州的教育制规定，被送到盲人学校。值得庆幸的是，爸爸的收入虽然菲薄，却还支付得起我们的教育费用。我5岁那年，开始在哥哥就读的一所私人学校读书。

我能想象得出妈妈怎样对爸爸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让谢拉重蹈你的复辙，到盲人学校去上学。那会把她同明眼人隔绝起来。当你还看得见书上的字时，他们就教你读盲文。谢拉如果把书拿近些，看书是不成问题的。”

爸爸说：“对，我们一定不把她送到盲人学校。那里的教育很呆板。即使你还有视力，他们也不鼓励你去使用它。此外，我也不能让她像我当年那样，只习惯和残废人打交道，而完全不能适应在明眼人当中生活。”

我们镇上的小学校长非常理解我父母的心愿，收下了我。每天，当我和哥哥走出家门时，妈妈总是千叮万嘱：“你们俩要把走的路记好。格瑞海姆，不管干什么事，都不要松开谢拉的手。”而我是多么渴望甩掉他的手，跑去和别的孩子玩。但哥哥就是不肯放开我。一路上，在人声鼎沸的街道上，我们俩一声不吭地走着，我真是厌烦透了这样的走法。

一天早上，我终于用力地挣脱掉格瑞海姆那只紧握着、护卫我的手，开始跑了起来。还没跑出多远就听到哥哥在呼喊：“谢拉，快回来！”我不理睬他而径直朝前跑，却一头撞在另一个孩子身上，在马路摔了个倒栽葱，我泣不成声地哭成了泪人。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自由的极限。

在学校，我逐渐意识到其他的孩子比我的日子好过得多。我读书时得把书紧贴在脸上，这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坐在身旁的朱迪把书放到了一边，咯咯地笑了起来。她问道：“谢拉，你为什么闻书本呢？”

“我没有闻书本，我是在读书。”传来了更多的咯咯的笑声。除了朱迪，马尔卡、珍妮和伊安也都笑了起来。

“你是个傻瓜。”朱迪把书放在一臂远的距离说，“我能像这个样子来读书。”

于是我把书拿开了，但字迹立刻变得模糊不清，我又把书贴到脸上，再次证明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书本上分明地写着“猫稳稳地坐在垫子上”的字样。“我一点也不傻。”我坚持说。

一回到家，我就马上向妈妈问：“妈妈，我为什么不能像朱迪和其他人那样，把书拿远一点看呢？”



“哦”，她说，“那不过是由于他们的视力比你的稍微好一点罢了。”

从此，我知道了在某一方面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但是由于我父母的十分明智的教育，使我感到，无论在任何方面我并不低于任何人。那时我丝毫也不知道我妈妈曾去学校里会过其他孩子的家长，谈到我的弱视问题。她请家长们对自己的子女解释这一点，以便使他们尽量地理解我，接受我。

一天，我到朱迪家去喝茶，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了我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当时正在放电视，只有我一个人得走到电视屏幕前去分辨上面淡蓝色的光亮的人影和其他的物体。朱迪和她妈妈坐在后面的沙发上。我听到她们边看节目边发出阵阵笑声，丝毫没有议论我走得离电视近的古怪行为（我猜想妈妈已经和她们谈过我的眼疾），也没有埋怨我阻挡了她们的视线，然而，我意识到了她们不像我们家的人那样，只能听电视的声音。对于这个，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根本没有对妈妈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尽管我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但是却阻挡不了我设法要做其他孩子们所能做的一切的决心。当我7岁的时候，我一心要骑两轮自行车。我平时常常在花园里骑自己的三轮车兜圈子时，不是撞在垃圾桶上就是撞在墙上，因此大人们严加训令只准我在花园里骑车。但当格瑞海姆得到一辆名牌两轮儿童自行车做为生日礼物的时候，我也特别想得到一辆两轮车，想得我心里痒痒的，我就拼命去磨爸爸妈妈，问他们：“我为什么不能得到一辆两轮自行车呢？请给我买一辆，行吗？”

对于我这每天不忘重复的请求，和听到我其他的请求时一样，妈妈绝不肯说：“因为你看不见，所以不能答应你。”她要编出种种的理由来解释。她连对自己也不愿承认我视力不佳这一事实。爸爸在绝望中仍然侥幸地希冀着我的视力是正常的。在妈妈

对我解释时，他默不作声。大概他是想到了自己的处境，通过他亲身经历的许多困苦遭遇，爸爸想象得出我的境况绝不比他的好，因为他知道我继承了他的眼疾。

但是，在我幼稚的心灵中，爸妈的态度使我想到的只是哥哥得到了两轮自行车；而我却没有得到。我不明白这究竟为了什么，我感到愤愤然。于是有一天，我不仅“借用”了哥哥那崭新锃亮的海克力斯牌自行车，而且擅自解除了爸妈对我的禁令。我取过车，把它推到大门外的街道上。我甚至不知道街上的交通一律靠左边这一基本原则，就跨上车骑了起来。我脑子里从没有关于汽车和其它车辆都有各自的行驶线这样的概念。然而，如同奇迹一般，我竟然没有被车撞上。我骑着、骑着，在骑到下坡路的时候也不知道停下来，就这样一直骑到了马路边、上了马路牙，并撞到了墙上。

前车轮碰瘪了、灯架子被撞弯了。天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的心怦怦直跳，在惊恐中把车就地放下踉踉跄跄地摸索着回家的路。到了家里，我吓得躲在楼上，心虚得大约呆了好几个钟头也不敢出来。

一会儿，我听到厨房里传来的话语声，是格瑞海姆带着哭腔对妈妈说：“妈妈，我的自行车丢了，有人把它偷走了。”接着是妈妈疲惫而担忧的声音：“我现在可顾不上你的自行车，格瑞海姆。你看见谢拉了吗？”

最后，我鼓起浑身的勇气走到楼下，把事情经过和盘说出。我已记不得妈妈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看到我安然无恙回到了家里而感到莫大的宽慰，根本不去提自行车怎么样了。格瑞海姆却抽泣着，到外边寻找他心爱的自行车去了。

接着，爸爸回来了。妈妈给他讲了我的惊险故事。惊骇万状之余，爸爸都顾不上发火了，他说：“谢拉，是什么鬼附了你的体了？你可能被轧死的啊！”随之，是死一样的沉默。我真想不出接

下去还会发生什么事情。爸爸终于又开口了，“从现在开始到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得把零用钱攒起来，修整那辆自行车……”

这件事过后没多久，我们家里便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它使得格瑞海姆自行车的损失立即显得无足轻重不足挂齿了。父亲的视力终于衰退到无法继续他在诺丁汉地区兜售绒布生意的地步。这一沉重的打击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方式。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孩子们可以和家长谈论家里的重大事情。因此，哥哥和我不十分清楚爸爸丢掉了饭碗这件事。一天我们从学校回到家里，妈妈就要我们帮忙打点行李，这时我们才第一次得知一点点关于家里发生变化的情形，但妈妈只字未提爸爸的眼睛已经坏到不能出去工作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妈妈？我们要搬到哪里去？”我问。

“我们买了一个小店，”她说，“我们要搬到诺丁汉去。”

诺丁汉！我们要从有记忆以来一直生活着的城镇迁移到大城市去了。这使格瑞海姆和我激动不已。父母亲十分清楚，我们的新家位于整个城市最贫穷、最简陋的地区——圣·安威尔路。我和格瑞海姆却完全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生活走下坡路的第一步，也没有意识到搬家之后，我们将遇到完全不同于我们已经处惯了的熟人们。更想象不到对付未来的四邻和他们的孩子们比在我们从小久居的地方要困难许多。

那个时候，哥哥和我感到的只是搬家的满心喜悦。我们的店铺位于一个街角上。这时妈妈比爸爸的视力好得多。所以由她布置绒布货品，标写价格票签，并告诉爸爸票签上写的是些什么内容。我们已经习惯于爸爸长时间地在外兜售货物，而现在他却总是留在家里，和我们在一起。

“来吧，”他常常说，“现在，杰特·摩根的广播时间到了。”我们就围坐在爸爸身旁，一起听收音机。听广播对我们比看电视更有趣。不用看，我和哥哥也完全想象得出摩根如何在广袤的宇宙

间冒险的样子。听过广播后，我们就会在后花园里扮演这些故事。

很快，格瑞海姆和我发现这里街道上的孩子们比过去我们城镇上的孩子们粗鲁得多。他们用非常无礼的名字喊我们，妈妈总是告诉我们不要理睬这些恼人的挑衅。大概由于这个原因，我和哥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

格瑞海姆特别会敲我的竹杠。晚上睡觉时，每当我要求他讲个故事，他总是说：“如果你明天跟我打板羽球，我就给你念一章伊尼德·布雷顿的故事。”我抗议说：“这可不行。我不喜欢打板羽球，板羽球太硬了你是知道的，我很怕被球打痛的。”可是，最终在伊尼德有趣的《牧羊犬的影子》的引诱下，我勉强地让步了，说：“好吧，只要不用硬的球，我明天就和你打一盘板羽球。”平时这种讨价还价总是因为格瑞海姆与我的争执而没完没了地进行着。他坚持说如果不使用正规的球，就算不上真正的板羽球比赛；我则主张要是不用软质的球，我绝不和他打。常常是我取胜，既说服他同意使用网球又答应给我读上一段故事。

爸爸也常常编造有趣的人物和故事，讲给大家听。但我们最爱听的是一个真实的叫做“诺丁汉车站”的故事。我们恳求爸爸：“给我们讲讲‘诺丁汉车站’的故事吧！”他强打精神极不情愿地开始讲起那并非虚构的往事：一天晚上，下班的路上他在诺丁汉车站换车，等着乘坐末班车回家，“嗯”爸爸说，“我走进酒吧叫了一杯茶，想找个座位。那是5点钟的样子，正是大家都下班回家的时候，因此酒吧里十分拥挤。不过那间小屋里或许是唯一的空位子居然被我找到了。我坐下，一边喝茶一边吸烟。我喝完那杯茶就在烟灰缸上把烟头熄灭……”这里正是我们一直等待的节骨眼，于是我赶紧接上去说：“但是，那并不是烟灰缸……”格瑞海姆总是用噓声使我静下来，让我不要打断这最精彩的部分。“是的，谢拉，你说对了，那不是个烟灰缸，而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人

的果酱馅饼。”听到这儿，哥哥和我欢天喜地地大声叫好，却不知道正是这个事件使父亲清醒地知道自己的视力已经衰退到无法继续到市场兜售生意的地步。

搬家后不久，为我们选择学校的问题很快就提到了日程上。虽然这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允许我们读私立学校，但妈妈的观点仍未改变。她坚决主张我应该继续读普通小学，尽可能多地与明眼人生活在一起。诺丁汉学校当局对此持有异议。开始，他们只是劝说妈妈改变主意，继而与妈妈展开了措辞严厉而强硬的谈话，最后则威胁说如果我家执意不肯送我读盲人学校，他们就要采取法律措施。

妈妈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好吧，如果我自己想办法把谢拉送进普通学校，那你们就该准许她在那里注册。我说定了，这件事不烦劳你们操心就是了。”诺丁汉学校当局当然很不满意。但是，接着我们却遇上了好运气。妈妈前去联系接洽的那所小学校校长本人，也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大概是出于同病相怜的缘故吧，他非常同情我的困境，而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位长者有一颗仁慈、善良、同情的爱心。他欣然地同意接收我入学。这对我来说真是福星高照，至今我仍对他这一决定无比地感激。正是这个决定，为我铺设了通往光明生活之路，尽管它同时又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之路。

在许许多多困难中的一个难题是那时有着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上普通学校对于盲人并非最佳道路。如果你和明眼人一起读书就不能得到任何额外帮助，要么你就索性上专门为盲人设立的学校。面临这样的舆论，我开始了在兰铃山小学校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孤立无助地被同学们撞来挤去的可怕情景。这所学校学生比我原来那所学校的学生要多得多。在同一个时间里，他们到处疯跑、扯着嗓子大声喊叫。我仿佛突然置身于一个料想之中却又连做梦也未曾到过的疯狂世界。在做游戏

时，我只能倚墙而坐，远远地躲在一旁，听着那狼呼鬼嚎般的声音，透过眼角望着那些应接不暇、晃来晃去的粗野的人影。

十一岁那年，我转到了坐落在山上的现代中等学校。这时我已经能一个人独自去上学了。每天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我常常绊倒在住家门旁放着的牛奶箱之类的东西上，还会碰到一群专门等着嘲弄我的男孩子们。这对于我犹如遭受两面夹击的苦刑。奇怪的是，一条属于这群男孩子们的杂种狗很喜欢我，而我也很喜爱它。我常常拍拍它，抚摸它一阵子。如果男孩子们不在，它就并排和我一起走到学校去。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产生了在某些时候，动物比人更仁爱、更可取的想法。

自然，我到了教室之后，还会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大问题是：即使我坐在第一排，也还是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有一天，英语教师蓓尔女士允许我走到黑板跟前去看，上面写的是一篇又长又难懂的课文中的语法。我一次最多只能看上一行，拼命默记在心，然后走回桌前把记住的东西写下来。我的频频下位子，激起了同学们越来越强烈的愤慨与恼怒。因为每次我走到前边时，都会挡住大家正在抄写的板书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没过一会儿，教室里就怨声载道了。“我正抄这块呢，老师。请您让她躲开一点吧。”“老师，她挡住光了。”蓓尔女士很同情我的困难，她对大家说：“噢，请大家稍微等一会儿。”然而，老师的话没能和缓教室里的紧张空气。我站起来三次之后，在一片惶然的抗议声中，我下定决心不再下位子。立即，喧闹的教室里随着一阵解脱般的叹息声而沉静下来，只听到繁忙的钢笔划动在纸上的嚓嚓声。我坐在座位上，发下誓言：自己宁肯当个文盲，也决不再下位子而激起“民愤”了。这样做我得到的唯一补偿是：从此我开始建立了训练有素的良好而超常的记忆力。

的确，一些老师和学生不能体贴我的处境，但也有心地善良而可亲的老师和同学。对他们我是会永远刻骨铭心的。比如，在

地理课上，我对识别图表上的小印刷字体和各种记号、符号等感到很困难。我的地理老师便经常在课下对我进行个别辅导。他的心血和劳动使我们师生双方都获益匪浅。那一年我的地理考试荣获第二名。这证明，只要给我创造条件，我是能与其他同学并驾齐驱的。后来，我的视力进一步衰退了，但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没有掉下去，甚至还上升到水平更高的班级，并且学得很好。尤其是那些以讲座形式教授的课程，我可依靠良好的记忆学得更加出色。如我在历史课和需要自己动手实验的自然科学课上，表现极为突出。我能轻而易举地记住玛格娜·凯塔和亨利八世妻子的名字；奇怪的很，我还能熟练地使用酒精灯操作。而像地理课，我则需要老师给以额外的辅导。数学课情况就更糟，因为我看不清小数点，也无法按部就班地随着老师写在黑板上的算式建立起思路。

在学校，我也希望像其他同学那样广交朋友，我主动地和他们做游戏，但由于视力的限制，无论我怎么努力，也玩不到一块儿去。这常使我感到落落寡欢。尽管我不善于打网球，倒也总被列入球员名单，当然这不用说，我被排在最后，即在其他同学编好对垒双方后，只剩下一个女孩子成单时，才轮到我去充数。换句话说，我是全班最最蹩脚的网球队员。

通常我的搭档是安吉拉，一位温柔的姑娘，我在校期间的好朋友。我们打球时，她明白我屡屡打不中，但是尽了很大努力的。她会提醒我：“球过来了，谢拉。”在我眼前网球场犹如一片模模糊糊的绿色海洋，我站在那里，把球拍举在空中，一遍遍地祈祷着：让球击到球拍上吧！也许五十次当中有一次，球能击中球拍。而最终，我们总得想点办法结束这种命中率几乎是零的比赛。安吉拉常常故意地把球打出界外，于是体育课其余的时间我们就用来“找”球。

学校要召开家长会了，我们的自然科学老师托马斯女士让同

学们把撕开各种花瓣摆放在一起，然后分别标出它们的名字。这是我们植物课上常做的一项比较复杂的工作，我做起来总觉得很困难。细心的托马斯女士走到我面前说：“谢拉，我知道你有困难，所以我安排你做另一件工作，好吗？”

“好吧，”我立即回答，我才不愿在其他同学忙碌地从事一件复杂的工作时，默默地坐在一边，让家长评头品足地议论我呢。他们准会说：“瞧，坐在一旁的小姑娘必是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学生。”

万万没想到，托马斯女士竟为我安排了一个那么倒霉的差事。她说：“谢拉，你到教室后边去，那儿有张桌子，整个都归你使用。”我跟着她走到后边的桌前，她说：“你看，这里是一些空的果酱瓶，你分别把不等量的水放入这些瓶子里，然后用一支铅笔去敲击它们，看看能够发出多少不同音调的声音。”

我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我显得与众不同而使我感到难堪万分的呢？我请求她：“老师，我可以做点其他的工作吗？我能够打扫仓鼠的笼子，您说行吗？”

她听后不太高兴地说：“谢拉，我以为你会喜欢我要你做的工作呢。我考虑了很久才想出这样一件适合你做的事情。想想看，你不但能够听到敲击的声音，而且可以感觉到水量的多少。”

“是的，老师。可是与其他同学所做的很重要的工作相比，这件工作实在太幼稚了。”

大概托马斯女士十分偏爱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这个得意方案，所以不由分说地坚持要我按她的安排去做。我最终拗不过她，只好一个一个地往空瓶子里灌入数量不等的水，再用一支笔敲击这些瓶子。违心地硬着头皮执行老师布置的任务时，我分明地感到家长们用我所不愿接受的、充满怜悯的眼光盯着我。这使我痛苦而屈辱。

校外的生活也是挫折不断地向我袭来。我结交的朋友，包括



安吉拉在内都和我一样，是十几岁的孩子。在那样的年龄，他们很难体会和理解一个失明的姑娘也同样地渴望着校外活动，也同样地希求得到人们的关注。晚上，朋友们外出作乐，我也想同他们一起去玩。可是一旦跟着他们出去，就意味着我得绝对服从他们的安排，必须做他们要做的一切事情，去他们要去的一切地方。我既不能自己单独地出去，就只好受他们的牵制，不这样，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跳舞的时候，我不安地坐在一旁。当有男孩子过来邀我做舞伴时，我担心自己跳错了步子，或者不能很好地和他配合；如果没人来邀我，我会焦躁地坐在椅子边上，由于眼睛看不见，我不是担心女孩子和男朋友们跑掉了，把我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就是疑心由于自己眼睛，没人愿意邀我跳舞。总之，我心绪不宁矛盾万分。我把自己比做一朵没人采摘的枯黄而凋闭了的草花。

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可怕的场面：在舞会进行当中，音乐突然停了，和我跳舞的男孩子立即丢开了我，只听得人们纷纷离去的脚步声，大家都退到大厅的一边去了。我感到周围已经空空荡荡的。我故作镇静，假装整理起头发来，以掩饰内心的恐惧与慌张。谢天谢地，我终于听到有人走近我的身旁，是安吉拉前来救驾了。

有过这次痛苦的经历，我便从此不再参加任何舞会。我恨、我憎恨这一切。我不再与自己的同龄人交往，也摒弃了与男孩子们结交的机遇。有时，即使我能与他们相遇，也从来引不起他们的兴趣。这使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今生今世我不会与任何一个男子缔结良缘了。

由于我的固执骄傲和拒不承认自己与明眼人的差异而使生活变得更加严酷，而另一方面，生活也补偿了我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这就是深知失明之苦的双亲不仅给了我巨大的爱，而且给了我困难面前不畏惧、不低头的勇气。妈妈教会了我许多我看不